

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汉字研究——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例

□ 张彦希 古籍馆外文善本组

西方的汉学研究可以说是以汉字研究为基础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对于汉字的研究层出不穷,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的不断扩展和繁荣,到了18-19世纪达到了高潮。在19世纪之前,西方对于汉字的研究多为解释性的介绍,其中以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 1585—1658)的《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为代表,西方人的汉语研究逐步形成体系,开始探讨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学问题^①。到了19世纪,西方汉字研究的主要群体是以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等为主的“业余者”^②,出于工作的需要和传教的目的,他们必须掌握汉语,熟悉汉字的意义和书写规则。这些业余者对于汉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字典的编纂上。在汉英字典的编纂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编写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编纂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编写的《汉英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这些词典的编撰主要以《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经典著作及前人的汉字研究为基础,结合个人实践经验,编纂出具有个人特色、职业特点和时代风格的词典,在西方汉字学中有重要价值和影响力,为西方汉字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礼逊是一位来自英国苏格兰地区的新教传教士,曾到过澳门、广东等地区传教,曾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汉文翻译。他是一位开创性的汉学家、词典编纂者和翻译家,可以说他是英汉汉英词典编纂的第一人。在1815—1823年间,马礼逊编纂完成了六卷《华英字典》,并在澳门出版,该字典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汉英字典,第一部分名为《字典》,是按照部首顺序排列的汉英字典,共分为三卷;第二部分名为《五车韵府》,是按照注音字母顺序排列的汉英字典,共分为两卷;第三部分为英汉字典,名为*English and Chinese*,该字典为一卷本。国家图书馆藏马礼逊《华英字典》六卷本全,内容完整,品相良好,该馆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词典,有着重要的收藏和研究价值。马礼逊之后,卫三畏和翟理斯等西方传教士所编撰的汉英字典,也是在学习了马礼逊《华英字典》基础之上编制而成,并对其内容有所借鉴和参考。

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第一部分《字典》,是全书所占篇幅最大的一部分,收录汉字4万有余。这一部分是根据《艺文备览》,“将汉字笔画分为214个字根来编排”(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即根据部首顺序排列,这也是中国传统辞典的编排方法。由此可见,马礼逊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遵照了本地化的译介方式,尽

^①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6—137页。

^② 杨慧玲:《汉英双语词典的诞生及其早期设计特征》,《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第387—393页。

量保留中国文化原貌,并且在这一部分中,融入了很多中国经典哲学思想和文学作品,使得这一部词典巨作不仅停留在阐释汉字本身的含义层面,还包涵着中西文化思想传播的重大意义^①。在1815年出版的第一卷《字典》中,扉页便引用了中国士大夫的话——“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作为引言,以表明该字典对学者会有所助益。另外,马礼逊在汉字的释义中,大量引用《诗经》等经典作为示例,如“仇”字的释义中,马礼逊先是解释了“仇”所包含的几个基本含义——“*To unite. A pair. Proud. Resentment. An enemy*”(求偶、配偶、傲气、仇恨、敌人),并说明了其最初的使用法,即追溯了词源——“*In the first sense, it used as ‘逮’*”(古通“逮”),在进一步阐释该字的使用法时,则引用了《诗经·秦风·无衣》中的名句“修我矛戈,与子同仇”,并译为——“*Put in order my lance and spear, that I may join you, and make your enemies mine.*”^②在文字的阐释中引经据典,这样的编撰方法不仅能使让西方人看懂中国汉字的含义,也能让中国文化和传统典籍中的思想为西方人所认知。

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第二部分《五车韵府》,收录汉字1万有余。这一部分主要是参照《康熙字典》,按照汉字注音顺序排列(*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编纂而成,在注音系统的选择上,马礼逊共选用了“24个声母、58个韵母、4个声调符号外加送气和重读符号”^③,排序的方式上更加体现出“英语化”特征。另外,在汉字含义的阐释方面,与第一部分不同的是,这一部分没有大量的引经据典,而是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解释方式,如“叉”字的释义中,马礼逊将其阐释为“*The fingers of the hand inserted in to each other; any thing diverging, or forked; a road diverging into two or more directions*”^④(手指交叉;交叉的事物;分叉路),并组词“叉手”作为用法示例。这部分的编纂方法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角度出发,为了更好地适应西方人的使用习惯和思维方法。如果说第一部分能让使用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汉字的释义和其背后蕴含的中国文化,第二部分则是为了便于使用者快速查阅和掌握汉字的使用法。

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第三部分是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主要是英汉对照,即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出常用英文词汇、词组和习语,并给出相对应的中文词汇,其中不乏一些中国文化经典论著的引用,如对于英文词汇“believe”的解释中,除了给出中文相对应的“信”字作为解释外,马礼逊还引用了儒家经典论著作进一步阐释——“*If there be no desire to learn, that which is believed may be false, 不好学则所信或非*”^⑤。该释义出自朱熹《论语集注》,原句是“不笃信,则不能好学;然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或非其正。”由此可见,马礼逊在编撰字典时,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译介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作为一部英汉字典

^① 李丽:《马礼逊〈华英字典〉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解读与呈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83—90页。

^②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u: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 Part I Vol. I, p.65.

^③ 王仲男:《马礼逊〈华英字典〉所记录注音系统及其英语化特征》,《北方论丛》2021年第4期,第94-100页。

^④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u: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 Part II Vol. I, p.3.

^⑤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u: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art III, p.41.

典，马礼逊所收录的词汇也并非全面，马礼逊本人在前言中也坦言道，这部分英汉字典是其花费13年时间编撰而成，如果使用者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那么仅仅凭借这样一部简单的字典，是无法完全掌握和应用汉语的。但是，如果把完整版的《华英字典》结合起来使用，三个部分各取所长，各补所短，那么学习者将会获取更多有关汉字和中国文化的信息。

总的来说，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有三大方面的贡献意义。首先，作为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他将新教传入中国，让中国人更好地认识了西方宗教和文化。在《华英字典》的编撰中，马礼逊将基督教词汇采用“本地化”翻译策略，便于中国人理解，在字典中的“146项基督教词汇单位”^①中，其翻译方式大多可在明末文献中找到出处。其次，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对后续汉英英汉字典的编撰起到了开创性的意义，并且掀起了一股中英字典编撰的潮流，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在《五车韵府》的编撰中，马礼逊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需求，用“英语化”的注音顺序来为汉字排序，这种“基于用户查询需求和使用技巧的设计理念”^②，为后续英汉词典的编撰提供了借鉴。最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在中国儒家思想的译介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华英字典》中，特别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中，马礼逊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据统计，出自《论语》的句例引用可达200余条^③，由此可见，马礼逊极其重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通过字典编纂的方式，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更好地传播和发扬。

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代表，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汉字研究，多以编撰中西文字典的方式展开，为了实现传教的目的，首先就要打开语言的大门。虽然这些字典的编撰带有基督教色彩和个人主观色彩，但这些传教士在字典中对于中国文化的译介和引用，起到了中西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目的，同时也为后续的中西文字典编撰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国家图书馆馆藏不仅有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六卷完整版，还有如卫三畏和翟理斯等19世纪西方汉学家所编撰的字典，及其对汉字研究的论著等，可为这一时期西方汉学家的汉字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参考。

^① 李璐溪：《基督教词汇的本土化及背后的策略考虑——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切入点》，《辞书研究》2021年第5期，第92—102页。

^② 耿云冬：《马礼逊辞典编纂理念及其当代意义》，《长江学术》2020年第1期，第118—124页。

^③ 李金艳：《马礼逊〈华英字典〉中儒学思想的译介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62—69页。